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东吴智库研究成果

姚传德·著

RIBEN JINDAI CHENGSHI FAZHAN YANJIU

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研究

(1868-1930)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姚传德·著

RIBEN JINDAI CHENGSHI FAZHAN YANJIU

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研究

(1868-1930)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研究:1868~1930 / 姚传德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672-1619-8

I. ①日… II. ①姚… III. ①城市史—研究—日本—
1868~1930 IV. ①K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8390 号

书 名: 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研究(1868—1930)

著 者: 姚传德

策 划: 刘 海

责任编辑: 刘 海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出 版 人: 张建初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QQ: 64826224

E-mail : Liuwang@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336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619-8

定 价: 6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前言

城市的产生距今已经有 5000 多年的历史,但是城市化是最近 200 多年间的事。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不久,因为定居的生活、剩余财富的增多、社会分工的发展、国家的产生,城市也随之产生。但在整个农业时代,乡村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主体和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人口的主要聚集地。虽然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存在于城市之中,但那时的城市是依附于乡村而存在的。

17 世纪下半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自此,人类开始走向工业时代。工业生产是一种加工活动,是对自然的物质施加物理与化学的变化来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一种生产活动,人类由此更多地突破了自然的限制。工业生产的集聚性使得交通发达、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以及拥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出现了生产的集中与人口的集中,工业时代的城市由此产生。同农业时代的城市不同的是,工业时代的城市既是生活基地,也是生产基地。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由于人类消费生活内容的丰富与提高,工业生产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因为动力革命,工业时代的生产能力比农业时代提高了成千上万倍。在工业时代,农业尽管仍是基础产业,但已变成了次要的产业,在当今,像美国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3% 左右。由于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基地转移到了城市,所以,工业化时代同时也即是城市化的时代,城市化的程度也就成为现代化的几个主要指标之一和当今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标准之一。

城市化首先出现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到 1911 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比重的 78.1%,标志着城市化的全面完成。同期的德国,其城市人口的比重也上升到 60%,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工作。法国由于大革命时代的极端政策,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缓慢,一直到 1931 年,城市人口比重才上升到 51.4%。美国经济虽然发展迅速,1910 年其工业产值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 35%,但是由于美国此前忙于开发广袤的西部地区,城市化

进展速度较慢。一直到西部开发基本完成后，城市化水平才迅速攀升。190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为35.1%，1910年便急剧上升至45.6%，到1930年达到了56.1%，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任务。

亚洲最早进行城市化的国家是最先迈开近代化步伐的日本。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展开了近代化运动。1880年以后，日本开始了工业革命。从封建时代承袭下来的城市在明治初期因为政策调整经历了短暂的萧条之后，开始高速发展。1879年，其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不过为11%，到1898年便增加到18%，1908年达到25%，1920年增加到32%。这一比例虽然远远不及英、法、美、德等几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在世界上已经走在前列。而且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人口急剧增加，从1887年的3870万人增加到1921年的5678万人，净增加了1808万人口，增长率为46%。所以，如果扣除总人口急剧增加这个因素，日本城市化的速度也是相当可观的。日本全面完成城市化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中国城市化的真正展开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到2014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达到54.77%。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城市化的历史短暂，因而城市学的发展历史也就非常短暂。西方国家在18到19世纪之交才开始了城市问题的研究，到20世纪初方才出现城市史学。

中国因为城市化开始较晚，城市学诞生就更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有学者投入这一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逐渐走向兴盛。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开始了高速城市化，城市问题不断产生，这一领域的研究迅速成为显学，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日本由于城市化起步较晚，因而对城市问题研究开展得也比较迟。早在明治时代后期，个别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如片山潜、安部矶雄等人零星地开始了城市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工人运动与工人的生活。进入大正年间后，著名学者兼官僚关一对日本城市土地住宅问题进行了研究。此外，铃木武雄与藤田武夫对日本城市财政问题也进行了个别的研究。

二战后，美国学者给日本带来了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城市问题的方法，该方法重视基于史实的细致的分析与论证。在美国学者的影响下，日本诞生了一批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专家，如矶村英一、铃木荣太郎、贺喜佐卫门、铃木二郎、安田三郎、仓泽进、矢崎武夫等，日本的城市学研究开始走向繁荣。日本历史学家投入到城市史研究领域则是较晚的事情。到20世纪60年

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也进入了高速城市化阶段,城市问题日趋严重,诸如工业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居住问题、交通拥挤,尤其是工业污染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发生了多起伤人事件,“城市病”引起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的历史学家们开始了对城市问题的研究。柴田德卫从历史学以及国际比较的视角对日本城市发展过程以及当时所面临的城市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就了《现代都市论》;宫本宪一将城市经济、城市问题、城市政策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写就了《从都市问题到都市政策》。进入 70 年代后,从事城市史研究的学者如坂本忠次、桥本哲哉、石塚裕道、小路田泰直、大石嘉一郎、成田龙一、原田敬一等大量涌现,并出现了一大批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城市规划史的角度对日本近代城市发展进行研究的则有石田赖房、藤森照信、越泽明等人。

由于城市学研究起步较晚,因而对城市学研究领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城市学的理论虽然五花八门,但是缺乏一个为本学科大部分人所接受的高屋建瓴的理论体系。日本学者对日本城市发展史的研究也是这样,尽管各有所重,也各有一定之理,但不免以偏概全;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现象的阐述与史实的分析。在对近代日本城市发展的研究中,有些学者重视政府的作用,有些学者则强调大都市圈的作用,有些学者更倾向于研究地方都市,还有些学者强调地方自治体的作用等。

中国国内对日本城市学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杜建人的《日本城市研究》对日本城市化进程、城市制度、城市土地政策、城市生活环境等进行了集中的论述。赵光瑞的《日本城市化模式与中国的选择》探讨了日本城市化的机理以及空间演化模式,并对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行了讨论。张季风的《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论》通过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土综合开发政策及其功效,阐明了高速城市化时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江波、史晓婷的《日本城市与城市文化》从文化的视角对日本的城市发展史以及城市体系、城市构成与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这些专著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近代日本城市的发展,但不是专门的研究日本近现代城市发展史的著作。此外,曹康、杨栋梁、祝曙光、谭纵波、马约生等人对日本的城市规划、城市交通等问题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总体而言,中国国内对日本城市史的研究还极其薄弱。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在城市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沿海发达地区的很多城市在硬件建设方面同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已经相差无几,但是在城市软件



建设方面,如城市管理机制、环境保护机制、人员素养等方面,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国内各城市都出现了交通拥堵、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城市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中国下一阶段的城市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我们必须学习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走弯路。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文化圈,而且同样人多地少,所以日本在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借鉴学习。

由于城市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学科体系尚未完善,而且,近代城市生产与生活的内容与丰富程度也是农业时代、农村生活无法比拟的,因此,目前城市研究的内容也就非常庞杂,五花八门,难以一统。笔者以为,所谓城市是“市”与“城”这对矛盾的结合体。从今天意义上说,所谓“市”是指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人口的集中与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所谓“城”,则是指城市的秩序。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发展与秩序永远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发展初期,城市是无序的,但发展到一定时期,诸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传染病、居住拥挤、房地产价格虚高、功能区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与生活,人类必然要对城市的发展进行规范,采取各种措施解决交通、污染、居住、贫富分化、区域划分等问题,从而使城市发展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一种协调与平衡。当然这个平衡永远是暂时的,因为,未来新一轮的发展又会破坏这个平衡,之后,人类会再度努力使其达到平衡,这就是城市发展的规律。所以,发展与秩序是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住这一矛盾,才能纲举目张,才能从历史的角度厘清城市发展的线索,这就是笔者研究日本近现代城市发展的思路。

本书共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介绍日本近代以前的城市发展历程、明治政府建立近代国家的过程、近代以前欧美城市的发展过程,以揭示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的国内与国际环境。第二章主要分析介绍日本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集中、城市民众的生活、三大都市圈的发展以及城市问题,主要揭示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的状况。第三章以京阪神都市圈为中心分析日本都市圈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交通体系的形成以及轨道交通的经营体制,以揭示日本解决都市圈内繁重交通问题的历程。第四章主要分析介绍日本近代城市管理组织体系的形成以及日本城市规划制度的演变,以揭示近代日本政府规范城市发展的政策方针的演变与完善过程。最后一章对全书进行总结,并结合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目前进行的城市化提出一些启示性的建议。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近代城市化的历史背景	1
第一节 日本古代的城市	1
一、日本古代城市的起源	1
二、平城京时代的城市	3
三、平安京时代的城市	7
四、镰仓、室町幕府时代的城市	10
五、德川幕府时代的城市	19
第二节 明治时代城市发展的社会环境	36
一、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构	36
二、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宣布四民平等	39
第三节 近代以前西方城市建设与规划的演变	51
一、古代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发展	51
二、近代欧美城市的发展	58
三、欧美近代城市病与城市规划	71
第二章 日本近代城市化的进程	75
第一节 近代经济的发展	75
一、殖产兴业期间的产业发展状况	76
二、官办企业的民营化	77
三、产业革命与近代经济结构的形成	80
第二节 城市人口的增长	92
一、明治初年的日本城市人口分布状况	92
二、明治三十年日本城市人口分布状况	94
三、近代日本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的演变	95
四、城市工厂结构与职工人数的变化	100



第三章 日本都市圈内轨道交通的发展	172
第一节 日本全国铁路网的形成	172
第二节 三大都市圈内轨道交通网的形成	177
一、东京都市圈内轨道交通的发展	179
二、京阪神都市圈内轨道交通的发展	185
三、名古屋都市圈内轨道交通的发展	205
第四章 日本近代城市管理机制的演变	208
第一节 近代地方自治体制的建立	208
一、自由民权运动	209
二、地方自治的前奏——“三新法”的实施	212
三、地方自治制度的确立	218
四、君主立宪体制的基本确立与演变	227
第二节 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制度的演变与城市改造	234
一、近代城市规划的开端——东京银座炼瓦街的改造	235
二、东京防火改造以及民间区域开发活动	245
三、自主城市化道路的形成——东京市区改造计划	253
四、《都市计划法》的诞生	271
五、东京震灾复兴计划	280
第五章 日本近代城市化发展的特点与启示	291
第一节 日本近代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点	291
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291
二、先经济后民生的城市发展方式	294
三、民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化	295

四、都市圈发展模式	297
五、由欧化到自主的探索过程	298
第二节 日本近代城市化对中国的启示	299
一、城市建设应该本着务实的原则,融合东西方文化的长处	299
二、应以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发展的先导	300
三、城市建设规划应该具有长期性	301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02
主要参考文献	303
后记	312

第一章 日本近代城市化的历史背景

城市化是随着近代化、工业化的推进而出现的,所以,尽管城市的产生由来已久,但严格说来,城市化是近代社会的产物。然而,城市化也不是空中楼阁,它受各国的文化传统、各国近代化的模式以及当时世界流行的城市建设思想等因素的影响。日本近代的城市化也不例外,它是受到日本封建时代文化以及城市布局与建设风格、明治维新开创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世界城市化潮流的影响而产生的。

第一节 日本古代的城市

一、日本古代城市的起源

在古代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内,日本因为自然环境等因素,是最为落后的国家,一直到3至4世纪才出现国家,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则更晚。

城市的前身是村落。人类走向定居始于农业时代,在农业时代,生产的需要以及食物来源的固定化要求人类有固定的住所,人类因此走向了定居,开始建造供居住、储藏、娱乐等用的房舍,村落也因此出现。

日本的人类活动痕迹出现较晚,直到距今12000年前,日本方才进入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在绳纹时代^①,才开始了农耕生产。在绳纹时代中后期,人类开始走向定居。在日本,目前已知最早的人类定居遗迹出现在距今5500年前,当时的村落大约有20到30户,房屋建筑为竖穴型,即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表。当时人们穿着用兽皮以及植物纤维编成的衣物,开始佩戴

^① 绳纹时代是指距今12000年到公元前3世纪,在日本历史上属于旧石器时代,因为此时出土的陶器表面带有绳刻成的纹饰,因而这段时期被称为“绳纹时代”。



饰品。从当时的墓葬来看,此时的日本尚未有明显的阶级分化迹象,还处于财产公有的原始部落时代,迷信巫术,盛行自然崇拜。

国家出现之后,开始产生城市。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弥生时代”,主要是因为此时的代表性陶器出土于东京的弥生町。这期间在中国大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影响下,日本迅速进入了铁器时代,农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剩余产品增多,从墓葬来看,此时的日本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同时也因为剩余产品的增多以及争夺土地水源等,村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部落联盟逐渐走向地域国家。此时的日本开始了同大陆国家间的外交往来。中国的史籍《后汉书》以及《三国志》都有关于日本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该时期日本处于列国纷争时代,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国,各地出现的多达1087座前方后圆的巨大坟墓也印证了这一情况。在居住方面,出现了一直流传至今的干栏式建筑,只是此时这类建筑主要是用来存贮粮食,还没有成为住房的主流。在各国的中心地带都有较大的居住群落,防御工事明显加强,出现了数道城壕工事,城壕工事内外居民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同,这应该是日本最初的城市。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当时日本已经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的分工,并且手工业工艺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已经可以加工珍珠、玛瑙等饰品,还能织造美丽的“异文杂锦”。这一时期也有了一定的商业流通,日本各地域国家都存在大小集市以互通有无。就社会状况而言,当时日本最大的国家——邪马台国等级森严,“大人”为据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下人”为普通民众,地位有似农奴。还有一种类似奴隶的可以买卖或者赠送的“奴婢”、“生口”。该国还有不成文的法律。

此时在行政体制上,存在于畿内(今奈良县一带)的大和政权极力模仿中国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为了打破地方各部落联盟割据的局面,在各地设立“县”制,后演变为“国”。由中央任命最高行政长官——“县主”或者“国造”,但是这些人都出身贵族,所以同中国的郡县制相比只是形似而已,不过这在当时也是一种进步。

国府所在地是各地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大和政权的中心在今天的奈良以及周边地区。在7世纪以前,大和政权的都城经常迁徙,一度也曾经脱离大和地区,迁到本州西部的长门以及九州的筑前。但大部分时间,尤其是中后期,主要在今天的奈良以及周边地区移动。

据日本学者考证,在大和的轻(今奈良橿原市),有着日本最古老的都

城，当时是应神天皇主政。随后一度迁到今天大阪的难波，不久又迁回大和。都城的经常迁徙反映出部落社会的特征，此时，都城的建筑显然还很简陋，皇宫同普通豪农的住宅也只是程度的差异，尚无本质的区别，无非是在外围筑有土垒、石墙、壕沟而已。^① 此时都城的所在地经常变化，几乎每代天皇都要变更首都，日本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母系氏族社会从母居的遗风所致。^②

到大化改新前的推古天皇时代，由于圣德太子主政，都城开始有在大和飞鸟地区固定化的倾向，中间也偶有外迁。皇极天皇时期，为了在飞鸟修建板盖宫，召集四方工匠，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完工。这次修建的宫室是板顶，外有十二道宫门，且配有士兵把守；同时也修建了很多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诸如法隆寺等。另外，贵族开始向首都集中，居所也不同于农村普通贫民的竖穴房屋，而是干燥、凉爽的高脚屋。不仅贵族的衣着流行中国大陆的款式，日常生活用品也向大陆国家看齐。这样，该城就成为与农村风貌迥异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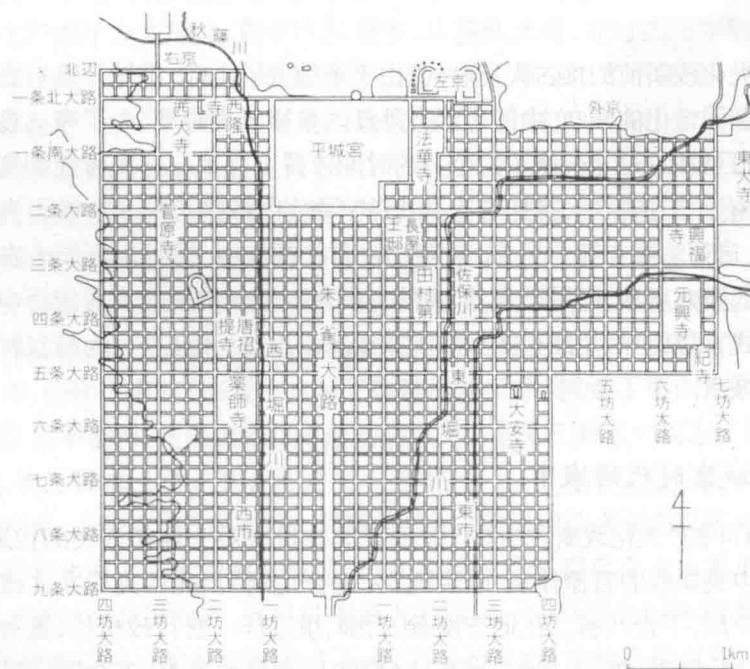
二、平城京时代的城市

646 年的“大化改新”力图打破地方氏姓贵族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依靠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以实现“公地公民制”。在中央设立太政官制以总揽全局，下设八省。在地方设有国、郡、里这样一套行政机构，置有中央政府任命的国司、郡司、里长。这一时期的日本总共有 60 多个国。官员分 30 个等级，系量才录用。当时中央贵族占有中央很重要的官职以及国司的职位，而地方贵族也占有地方政府的重要职位，可任郡司、里长，皆系终身任职，且能世袭。思想上采用地域性的神道、全国性的佛教以及儒家思想并以此维持国家的稳定。在土地制度上，用班田授受法与租庸调、徭役制度，将土地与人民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将全国的人口编入户籍，每 6 年编制一次户籍。法律上将民众分为良民与贱民，良民系由原来的部落民转化而来，是生产的主力，也是班田制与租调庸制的对象。贱民系原来的公私奴婢，有五种类型，数量不大，也班给少量的土地。所以，大化改新尽管希望打破地方割据，建立中国式的“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但是因

① 大類伸、鳥羽正雄：『日本城郭史』，東京：雄山閣，1977 年，第 66 頁。

② 喜田貞吉：『帝都』，東京：學術普及會，1939 年，第 1—22 頁。

为氏姓贵族在中央与地方有着强大的势力,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很多方面都大打折扣。比如五位以上的贵族拥有位田、职田,免除徭役赋税等。寺田、神田也免除租税,宅地与园地可以永久持有,并可以买卖。这就为后来“寄进”庄园制的兴起、武士政权的登台埋下了伏笔。



平城京

当然,改革终究还是部分地加强了中央的权力,中央对各地人力与物力的控制因此而大大增强,同时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在中央也需要建立一套庞大的行政机构,这样就需要有一个永久性的首都所在地。694年,持统天皇在飞鸟修建藤原京(大和国高市郡鸭公村,今奈良橿原市),该城模仿唐朝的长安,宫城位于正北面,一条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将京城分成左右两京,同长安一样设东、西两市,总共有96街坊,畿内各地的中央贵族根据品级以及人口由朝廷授予宅地。在京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虽然有市,但那只是贵族交换生活必需品的场所。

由于飞鸟地区三面环山,相对狭窄,所以在710年,元明天皇将都城迁往交通更加便利、视野更加开阔且距离旧都不远的奈良,在那儿营造了平城

京。期间的 741 年、744 年、745 年又曾分别迁都恭仁、难波、近江，最终还是迁回平城京。到 794 年，迁都至京都的平安京。在营造平城京的时候，所有的贵族及其家属以及从属于他们的下人，还有很多寺院等都迁往奈良。与此同时，一些在东市、西市从事买卖的百姓，从事营造寺庙佛像的匠人，进行调、庸运输的农民以及打算在城市谋生的、没有土地的流浪人士等都聚集到了新的京城。据日本学者泽田吾一的研究，平城京最盛时期的人口达到了 20 万左右。^①

当然，平城京不是一个因为商品经济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城市，它完全是依赖行政力量而建成的国都，所以官僚贵族的势力占绝对统治地位。据统计，这一时期五位以上的贵族有 130 人，官吏的数量则有 10000 多人。民众不是隶属于政府，就是从属于寺庙。

平城京格局与藤原京相类，但有所发展。整个都城呈棋盘状，正北面是朱雀门，正南面是罗城门，一条宽达 150 尺的朱雀大街将两个城门连接起来。城内分南北 9 条、东西 8 坊，每坊分 16 个区，都城的东西南北各 5 公里。都城周围修建有城墙。

政治中心位于朱雀门的北面，左右两京为市，从藤原京迁来的寺院也建于此地。著名的东大寺及其佛像就建成于此时。同藤原京一样，凡是愿意在京城居住的贵族、官僚、庶民等，都班给宅基地。由于都城面积只有藤原京的一半，所以建筑比较密集。

贵族的宅基地，三位以上为一町，五位以上为半町，初位以上为四分之一町。三位以上的贵族房屋，其大门可以朝向都城内大路。宅基地基本都是正方形，房屋一般都面南而建。居室与寝室分开。有瓦顶，也有板顶以及柏树皮顶。仓库与作坊一般都是草顶。庭院被墙壁或篱笆围起来，里面广植树木草坪。庶民的宅基地面积只有十六分之一町，甚至三十二分之一町。屋子狭小，一人一坪，仅够容身。一般都是草顶，建有木板地床，上铺席子。也有些贫困的人家没有地床，直接用芦席、竹席铺在地上。

由于政府重视提倡，在平城京修建了很多寺庙，寺庙都相当雄伟，尤其是皇家寺院——东大寺，它号称国内佛教的“本山”。再加上很多私家寺庙，到 720 年，平城京总共有 48 所寺院，当时僧侣们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在服饰方面，根据阶层的区别，官员们拥有礼服、朝服、制服这三个层

^① 沢田吾一：『奈良朝時代民政經濟の歴史的研究』第十七章，東京：柏書房，1972 年。



次。男子着冠佩玉、女子挽发，但是庶民还是穿戴古老的简单的服饰。^①

由此可以看出，就城市而言，无论是在物质层面，如建筑风格与建筑布局、服饰等，还是在精神层面，天皇政府在推行大陆国家（中国）的体制与思想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同 1000 多年后的明治维新一样，大化改新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一般都是先在贵族阶级中推行新的政策，由他们起表率作用，而后逐渐推向全社会。从以后的日本社会发展来看，这次革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接受了东亚最先进的文化，日本遂成为儒家文化圈的一员，而有别于北方的蒙古与南方的泰国、菲律宾等地区。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模仿是后进赶先进的捷径。

不过，由于是依靠政治力量构建的城市，迁到城市里的贵族们有很多还不太适应城市生活，而且他们的女眷大都住在乡下，所以贵族们在每年的五月和八月各有 15 天的假期，这时他们一般都会归乡。另外，城市人口在近郊或者城里被分配了区分田，所以，城市尚未与农村完全分离。

专业技术匠人一般也都分有区分地，他们被免去了全部或者部分调、庸以及其他杂役，在一定时间内去作坊做工，贡献他们的技术。此外，还有一部分通过徭役征调来的、从事土木建筑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农民工。不过在奈良时代后期，也大量使用从市场雇佣来的临时工。

由于人口与财富的集中以及社会需要的多样化，原料、官作坊的多余产品和贵族的剩余产品等开始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因而城市商品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雇佣劳动者也日渐增多，从而导致了社会身份制度的松动。

虽然也有半个月开一次的东、西两市，但整个平城京的经济基础主要依赖租税，而不是商品经济。在市场活动的行商也不是专业商人，他们在市场休息的时段内仍然以从事农业为主。市场上的商业活动主要是以物易物，但也使用货币，尤其是在畿内地区。由于模仿中国唐朝铸造了日本最早的货币——和铜开珎，东、西两市也在政府市司的监督下，各种商品被明码标价，所以京城周边地区的民众接受了这种便利的交换中介物。另外，对于临时雇工也用货币支付薪酬。但由于铸币的出现是人为催化而产生的，所以在地方仍然是以物易物。总之，整个日本当时还处于自然经济阶段。^②

各地方的国府是各地方的中心，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且利于防守的地

① 大井重二郎：『上代の帝都』，京都：立命館出版部，1944 年，184—185 頁。

② 千田稔監修：『平城京』，東京：平凡社，2010 年。

方。同平城京一样,一般也采用棋盘型设计,只是规模更小。国府所在地一般建有国厅、国分寺、总社、军团、国学等,外国有土垒、壕沟等防御设施,城市中间也存在很多耕地,所以它们并非是今天意义上的市镇。官员、僧侣、军队等是国府所在地的主要消费群体,其中也有定期与不定期的市场,都置于国厅的管理之下。至于那种恒久的市场,当时尚未产生。

地方都市同平城京一样都是在行政力量的动员下兴建的。地方都市中,在规模以及重要性方面仅次于平城京的是国防重地、位于北九州的太宰府,该府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是九州一带的中心地,防御工事非常齐备。观音寺是九州的宗教中心,当地还建有学业院等。^①

连接畿内与四方的大道分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西海诸道,其中连接九州太宰府的山阳道是大路,东海道、东山道是中等道路,其他是小路。路上都设有大小不一的驿站,由各地国司管理,委任地方人士为驿站长,给予驿田以充工费。从事服务工作的“驿子”免除其他徭役。^②

日本是岛国,自古以来海运比陆上交通更重要,所以,很多地方如难波、大津、博多等,既是重要的地方统治中心,也是相当繁荣的良港。尤其是北九州的博多,由于承担着同大陆交流的功能,十分繁荣,政府还在那儿设立了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鸿胪馆等外交机构。^③

三、平安京时代的城市

大化革新后,在政府的倡导与组织下,日本大规模吸收了大陆传入的先进生产技术,因而农业、手工业生产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但是贫富分化也加大,同时由于大化改新的缺陷,律令体制开始出现混乱。由于户籍编制繁琐难行、班田数量不足、各级贵族与寺院都占有私田、农民负担加重等因素,贵族大量开垦土地或者圈占荒地,而农民为逃避租税都寄进到贵族的门下,成为贵族名下的农奴。为了自保,很多小贵族也寄进到大贵族的名下。如此层层寄进,公地公民制度严重动摇,而私家庄园则日渐扩大,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天皇政府尽管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因为遭到贵族世家尤其是大贵族藤原氏的极力反对和阻挠而失败。迁都平安京就

^① 平野邦雄、饭田久雄:『福岡県の歴史』,東京:山川出版社,昭和四十九年,第27—38頁。

^② 坂本太郎:『上代駅制の研究』,東京:至文堂,1928年,第1—106頁。

^③ 大島延次郎:『日本都市発達史』,東京:宝文館,1954年,第152—156頁。